

创四川

The Formation of Sichuan

一个四川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但他的四川精神不可战胜！



国家历史

唐建光◎主编

创四川

The Formation of Sichuan

一个四川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但他的四川精神不可战胜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创四川/唐建光主编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80251-733-2

I. ①创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四川省—地方史 IV. ①K29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5582号

Copyright©2011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创四川

作 者	唐建光
责任编辑	雷燕青
开 本	72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	14.25
字 数	210千字
版 次	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80251-733-2
定 价	48.00元

出版发行	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	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	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	(010) 64228516
网 址	http://www.jccb.com.cn
电子邮箱	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	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

四川人，四川魂（代序）

历史上，四川号称“天府”，地僻西南，物产丰饶。因此，它既被看做是安逸享乐之地，又被看做是狭隘、闭塞、自给自足的象征。艰难的蜀道以及重岩叠嶂的三峡，不仅仅是四川与外界的地理屏障，更是外人与川人的心理隔阂。

殊不知，无论是蜀道还是三峡，从来就没有真正隔绝过川内川外的交流。每一次举国动荡，无不波及四川。秦灭巴蜀，移民万户；西晋之乱，世家大族举家南迁；宋初平定，陕甘移民蜂拥而至；加之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，两次“湖广填四川”，对于四川的影响，无异于再造山河。形形色色的人群，就这样翻越崇山峻岭，穿越急流险滩，在天府之地重新安顿、生根。也就是在这个动态的迁徙和聚合过程中，“四川人”在此孕育，在此生息，在此繁茂。

与“四川人”相生相伴的，是四川精神的成长。与川人的成长历程一样，四川精神同样是一个叠层累积而成的过程，这其中既有以巴、蜀为代表的古四川的灵动，又有以李白、苏轼为代表的老四川的博大，更有以“湖广填四川”而来的移民造就的新四川的坚韧与包容……在这期间，每一次巨变，都是对四川之魂的重塑。正是在这一层层累积的过程中，四川精神更加丰满，更加葱茏。

“5.12”汶川大地震后爆发出来的“四川精神”，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数千年的厚积薄发。四川人在群山环绕、千江奔流的巴蜀之地，既安享风雨滋养、自然造化带来的丰

饶，也遍尝家国离乱、天地损毁的苦难。而这丰饶与苦难，毫无疑问，不仅仅关乎四川本身，更关乎中国。

1934年，《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》在《发刊词》中说：“四川是中国的缩影。”诚哉是言！四川的每一次成长，每一次动荡，每一次安宁，无不与中国之成长，中国之动荡，中国之安宁息息相关。中国与四川，这对母与子，不仅仅是滋养与反哺的关系，更是休戚与共的精神共同体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四川精神的成长，也是中国自身精神成长的历程。

在这本讲述四川人、四川魂的书里，我们将看到古蜀国的灵动，看到老四川的博大，看到新四川的坚韧与包容，看到四川与中国息息相关的运命。在时间的洪流中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长长的系列。无数的蜀人生生灭灭又似乎同时存在，而死者犹生，他们只是不断变幻，不断再生。在这变幻与再生中，四川精神万古长存……

编者

2010年12月

目录 Contents

创四川..... 001

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一千多年前，伟大的诗人李白写了一首《蜀道难》，他只是为了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，对蜀路做了浪漫主义的夸张。这艰难的蜀道，似乎隔绝了交流，平添了想象。因而在中原人的眼中，蜀人面目诡异。历史书中记载古蜀人蚕丛氏和他的人民是“纵目”。几位国君的名字也颇为奇怪：“蚕丛”“鱼凫”“杜宇”“鳖灵”。

古蜀国，故乡还是他乡？ 文/萧易	002
南迁：古蜀人的背影 文/萧易	013
蜀道何曾难 文/萧易	020
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 文/萧易	027

诗酒四川..... 033

随着古蜀人的迁徙与合流，古四川渐行渐远。而由秦汉南来的中原文化与古蜀文明的碰撞，逐渐孕育出一个千年繁盛的四川——一个属于李杜与苏轼、壮丽奇瑰的诗酒四川。

万古李杜诗 文/庄秋水	034
千年酒四川 文/庄秋水	041
苏轼出川：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 文/刘永峰	045

新四川..... 055

经历了由汉至宋的千年繁盛，元末和明末的两次战乱，让天府之国两度变成荒野，而明初与清初的两次大移民，又让这个富饶盆地绝地重生。

对于今日四川来说，清初的“湖广填四川”则是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，现代四川的面貌，由此得以奠基、固化。

明末清初：死亡与新生 文/宋石男	056
上四川去 文/杜兴	061
生根：直把他乡作故乡 文/黄艾禾	069
寻访明代移民后裔 文/黄艾禾	082
会馆：移民的精神家园 文/黄艾禾	085
四川菜，中国味 文/塔罗	089
谁是四川人？ 文/陈世松	095
寻根：乡关何处？ 文/杜兴	102
一个人，一条船，一座城 文/何晓鹏	109
出川：一出夔门天地宽 文/白郎	115
移民之子与中国命运：近代四川杰出移民后裔群相 文/宋石男	122

四川与中国..... 131

四川常被看做是中国的后花园，平日与世无争，但每当国家、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四川总能一次次站出来，充当着保卫家国、接续火种、绝地反击的根据地。从宋

蒙对峙钓鱼城，到保路充当反清先锋，再到抗日铸就中华民族之魂，每一次，川人总能摆脱地方意识的狭隘，进而将整个的家国意识融入到四川精神的再造之中。

绝地图存：从成都到钓鱼城	文/唐眉江	132
保路：四川人的家与国	文/刘永峰	141
求生到重生：红军的四川之路	文/吴启权	148
四川何以救中国	文/何晓鹏	153
蒋介石与四川的血泪因缘	文/王丰	159
血铸川军	文/吴志维	163
赖以“民生”救苍生	文/曹立新	173
天下盐，天下粮：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	文/李远江	182
发现李庄	文/岱峻	190
“三线”之子	文/黄艾禾	197

四川魂..... 207

同样为中国人，蜀人当然不能在共性之外。然而，地势与中原相隔，自称是别有天地的山国，沐浴着丰富的自然给予恩惠的人民，其气质一般是平静的。而在今日之四川，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，必定要有这样一种认识——必定要有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的态度，必须抱着“有了四川，有了四川人，中国终究要强盛起来”的决心。

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	文/孙展 苏琦	208
四川精神的两面	文/莫之许	213
震不死的四川精神	文/宋石男	215

创四川

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一千多年前，伟大的诗人李白写了一首《蜀道难》，他只是为了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，对蜀路做了浪漫主义的夸张。这艰难的蜀道，似乎隔绝了交流，平添了想象。因而在中原人的眼中，蜀人面目诡异。历史书中记载古蜀人蚕丛氏和他的人民是“纵目”，几位国君的名字也颇为奇怪：“蚕丛”“鱼凫”“杜宇”“鳖灵”。

近年来三星堆、金沙的考古发现，部分颠覆了历史上的习惯看法：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，西南地区则是蛮夷之地，人民茹毛饮血、不知教化。那些因沧桑变迁深埋土中的实物，被挖掘出来，说明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，它的背后，隐藏着古羌人、夏朝贵族、商朝、巴人、杜宇、鳖灵部落的古老背影。

蜀人从来不是一种神话，他们按照自我发展的序列缓步而行。他们由采集而渔猎，由渔猎而畜牧，由畜牧而农耕……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循着治水、择都的路线不停地迁徙。向东，向南，不停地寻找心目中下一个更肥沃的土地。每一次迁徙，都给成都平原创造了新的契机，成都平原也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全国的迁徙者与逃亡者。

在几千年之后，我们不可能对远古历史进行完全可观的复原，但是当我们追溯成都平原历史上那些波澜壮阔的大迁徙时，那些曾经给成都平原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背影，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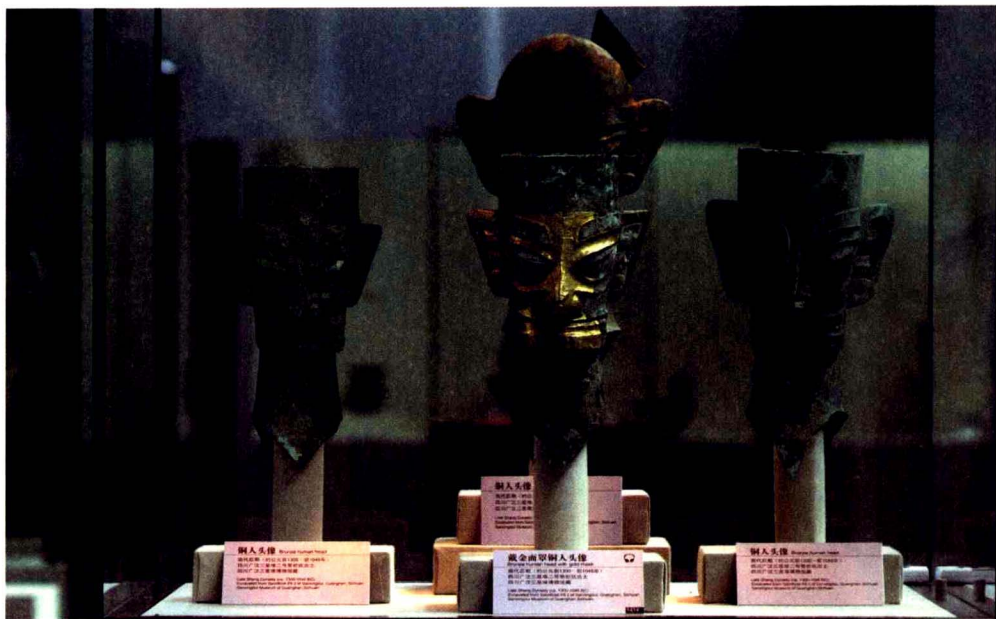
古蜀国，故乡还是他乡？

文 / 萧易

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，广汉鸭子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，飘荡在天空中。就在这天，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，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、纵目面具、青铜人头像、金杖等大量珍贵文物。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就此呈现，即为三星堆。

2001年，成都苏坡乡金沙村传来消息，那里又发现了大量象牙、青铜器、金器、玉器。这个遗址被命名为“金沙”。金沙与三星堆显示出了强烈的联系，他们就如同父与子，一脉相承。

不过，这可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奇怪的一对父子了，它们诡异的青铜器不仅在中国找不到原型，就连世界上都找不到同类，有人甚至将其想象为外星人的杰作。



三星堆、金沙的发现，大抵还意味着对历史的颠覆。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在北方，西南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，《后汉书》中的《西南夷列传》，就是对西南邛人、滇人、夜郎、僰人、叟人等部族的统称，可见当时中原史官的心态；唐代诗人李白面对古蜀，尚有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”的感慨。在这些观点面前，三星堆、金沙就格外引人注目——谁是它的主人？它究竟根植于四川本土，还是从他乡迁徙而来？

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渐渐揭示，古蜀国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，它的背后，隐藏着古羌人、夏朝贵族、商朝、巴人、杜宇、鳖灵

部落的古老背影。不同时期、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，带来了多样的文化，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，完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、金沙的转变，走过了长达两千余年的生命历程。蜀地对于他们而言，自是故乡，但其文化底色上，也一遍遍涂抹着他乡的色彩。

羌人南迁：第一缕文明曙光

关于古蜀文明的起源，史书一直语焉不详，唯有一个个上古传说，暗示其皇家血

脉。传说炎帝姜姓，为西羌牧羊人。黄帝入蜀，迎娶西陵国国王之女嫫祖，成了蜀人的乘龙快婿，把成都平原先进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中原，西陵国与黄帝部落，也在婚媾关系的前提下，联合在一起。黄帝与嫫祖的长子玄囂生在“江水”边，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，次子昌意生在“若水”畔，也就是雅砻江畔。

继三皇五帝之后的，则是大禹，“禹兴于西羌”，出生在北川县禹里乡一块叫“石纽”的巨石中。帝舜时代，一场大洪水肆虐了整个中国，大禹率领部落走出成都平原，治理了滔天洪水，并开创了中国第一王朝——夏朝。

传说时代的古史已经难辨真伪，而考古学上，古蜀第一缕文明之光，并不是后人想象的在三星堆或是金沙，而是来自一个叫宝墩的古老文化。自1995年以来，考古学家陆续发现了新津宝墩遗址、温江鱼凫城遗址、都江堰芒城遗址、崇州市双河遗址、大邑高山镇遗址、紫竹遗址和郫县古城七座古城遗址。

伴随宝墩文化的出现，成都平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。此前的成都平原并未发现古城的痕迹，宝墩文化的几处遗址已经出现城墙，为典型的夯土结构，面积最大的是新津宝墩遗址，城墙周长3200米，宽约

25米、高5米，面积有60万平方米，这个面积，甚至远远超过了商朝附属国的都城：盘龙城面积仅有7万平方米，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还要略小。

宝墩人以狩猎为主，传统农业尚未启蒙，遗址出土了数十件石箭镞；陶器也在此时出现，迄今为止，宝墩共出土了千余陶器，有小平地罐、圈足尊、喇叭口高领罐等类型。学者段渝认为，宝墩文化的出现，暗示着成都平原已经进入酋邦社会。

1998年，成都市考古队对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，发现古城中央有一个大型房屋遗址——白色的碎石圈成一个长方形，中间等距离分布着五个用竹编围成的卵石台基，代表五个祭台。这里是宝墩人的神庙，它预示着宝墩人已经有了图腾崇拜与信仰，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宝墩文化是后人能在成都平原寻找到的最古老章节，距今大约4500—3700年，而在此之前，成都平原并未发现文明的痕迹，宝墩文化可能是一个外来部落。

这个猜测数年后即被证实。2000年，四川茂县营盘山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露面，遗址出土陶器与宝墩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，如同针线一般把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与长江上游的马家窑串连起来。



古蜀国金沙遗址墓穴，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。



在四川羌寨，流传着一首叫《羌戈大战》的古老史诗，史诗出自羌族释比的经文之中，讲述了祖先迁徙的历史：羌人由西北高原南下，翻过许多大山，终于来到岷江上游。他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。但是，这一带却住着高颧骨、短尾巴、身体健壮的戈基人，他们个头不大性情却很凶猛，双方互相争夺牧场，经常发生战争。

《羌戈大战》是羌人的创世史诗，描述了羌人从西北高原向岷江上游乃至成都平原的迁徙过程，戈基人（可能是一个氏族部落）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。远古时代，整个中国西部，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，到四川岷江上游，再到金沙江流域，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。古羌人从甘青草原到岷江，再从岷江迁徙到成都平原，如同一幅卷轴画，随着历史的演进，慢慢拉开。

传说，这支羌人的首领，便是古蜀第一位蜀王蚕丛，西汉扬雄《蜀王本纪》记载，蚕丛“其目纵，始称王”，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纵目面具，也被看成族人对他的追忆。这也是古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，这一次迁徙，给成都平原带来了陶器、古城，乃至图腾崇拜，成都平原由混沌迈入了新石器时代，从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，回到了人间。

有缙氏逃亡：青铜铸造技术传来

人们常说的三星堆，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，从文化上分析，曾经有过三种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汇：一期的宝墩文化，年代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；二、三期的三星堆文明；四期则已经跟金沙早期接轨。也就是说，宝墩人最后一次迁徙，来到了三星堆。

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转变，是从一些文物的剧变开始的。1987年的一个傍晚，几个砖厂工人在广汉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，发现了两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饰牌，同时出土的还有矛、斧、钺等玉石礼器。历史上，铜饰牌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物，在中国，只有二里头出土过类似的铜牌。

自1986年开始，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全面发掘，一种叫盃的陶器屡有出土，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。陶盃有三只袋形大足作为底座，一侧有柄。中国文明史上，盃的发明，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，他们仿制鸡、鸟的形态，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。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，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，这是只正视的眼睛。而这只眼睛的符号，却大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中。所谓的二里头遗址，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，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夏文化。

从年代上说，二里头在前，三星堆在后，它们的联系是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的，唯一的联系途径，就是传承。而在古代，这种传承又多以部族迁徙为基础。或许可以推断：在夏代的某个时期，有一支人群，从二里头出发，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，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。这个推断可以引出一段远古传说。

夏朝末年，今山东金乡一带，有个部落叫有缙氏。他们与夏朝国君有联姻关系。

《左传》记载，夏朝太康失位后，后继的儿子少康最终复兴夏朝，可见其战功赫赫。

《左传·昭公十一年》记载，夏桀为了炫耀威力，命令诸侯率本国军队在有仍氏国盟会。有缙氏国君一向对夏桀的暴政不满，在盟会中途愤然归国。夏桀看到有人竟敢公然违背他的意思，便亲率大军征讨有缙氏。有缙氏最终招架不住，四处逃散。

《楚辞·天问》和《汉书》中都有此记载，而有缙氏最终迁徙到何方的问题，却悬而未解。

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华认为，二里头与三星堆文明可能与有缙氏有关，有缙氏战败后，先逃亡到河南一带，站稳脚跟后，陆续向陕西、成都平原迁徙。这也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——